

90年代乡土小说的“守土”与“离土”现象

黄娟

(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 江苏 南京 210019)

[摘要] 20世纪90年代乡土小说创作中,存在着“守土”与“离土”两种创作意识,其作品相应分为“守土”与“离土”两种态势,表现“守土”现象的安守牧歌式家园型、安守寓言式乡村型的创作以及表现“离土”现象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创作,其创作方法和美学风格差异显著。

[关键词] 90年代;乡土小说;守土;离土

[中图分类号] I106 I3/7-0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2)04-0139-04

An 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of “Guarding Home” and “Leaving Home” in Native Novel Creation of 1990s

HUANG Juan

(Nanjing Technical Vocational College, Nanjing Jiangsu, 210019, China)

Abstract: “Guarding home” and “leaving home” were two kinds of writing consciousness in the native novel creation of 1990s, accordingly, whose works fall into two trends of creation. One is a loyal, adhering and pastoral style as well as a loyal, allegorical and rustic style, representing the “guarding home” phenomenon while the other one is a “realistic shock wave” style representing the “leaving home” phenomenon, whose creation methods and aesthetic styles are strikingly different.

Key words: 1990s, native novel, guarding home, leaving home

“17年文学”代表作之一是李准的《不能走那条路》。这部小说因为最早反映农村的合作化道路,在当时引起了极大反响。按照当时意见,宋老定买地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应被批判,而张栓不好好种地,妄图“吃飞利”,也要被批判。比如李琮认为“作品中却只把宋老定当做了自发资本主义思想的代表者,而把张栓放在不足重视的、好像不需要着重批判和改造的地位上。要知道,宋老定的落后思想和张栓的‘吃飞利’思想,是同时存在、并相互联系的。两者都是农村资本主义倾向的根据。”^[1]

抛开政治因素,我们可以换一种眼光来看,宋老定和张栓其实代表了中国两类农民的形象,在他

们身上,体现出“守土”与“离土”两种不同的人生态度:宋老定靠土地过活,他与土地是血肉相连的感情,他的人生就是买地、种地……一辈子守住土地;而张栓身上恰恰体现出农民的新质,即离土,他希望靠卖地积累的资本去做小买卖,倒腾牲口这种具商品流通性质的行为使他的生活具有了流动性,告别“守土”,走向“离土”。

在中国现当代乡土文学的流脉中,很多作品都反映农民身上的“守土”或“离土”的倾向,我们也可以从中隐约看出作家的“守土”或“离土”意识,这种现象在90年代乡土小说中表现的尤为突出。随着农村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随着市场经济对小农经济的冲击,随着城市文明对乡村传统

收稿日期: 2012-04-12

作者简介: 黄娟(1980-),女,江苏南京人,南京高等职业技术学校讲师,硕士,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

人伦关系的影响和改变,作家的“守土”与“离土”情感更加复杂与矛盾,面对着乡村的“常”与“变”,作家显得十分困惑,由此也分成“守土”与“离土”两种创作类型,而也带来作品在艺术风格和创作方法上的差异。

乡土文学“其诞生与乡土性从社会主流地位的退场有关,是城乡角逐、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冲突的结果,因而它必然成为文化冲突的表现物,负载沉重的社会历史内涵。”^[2]“守土意识”指固守小块土地和自然经济的生产、生活方式,在思想观念及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守旧、安于现状等等;而离土意识则与它相反。根据作家创作意识的不同,大体可分为“守土”和“离土”两种类型,而“守土”中又可细分为“安守牧歌式家园”与“安守寓言式乡村”两种。

(一)安守牧歌式家园

张炜在他的《融入野地》中提出:“谁没有故地?故地连接了人的血脉,人在故地上长出第一缕根须。可是谁又会一直心系故地?直到今天我才发现,一个人长大了,走向远方,投入闹市,足迹印上大洋彼岸,他还会固执地指认:故地处于大地的中央。他的整个世界都是那一小片土地生长延伸出来的。”^[3]这类作家将乡村当作精神的栖息所,笔下的乡村充满了和谐与温馨:这里有“一床被子一人一头通腿儿睡”的传统的生活方式(赵德发《通腿儿》);有夫妻在生死间相依为命相濡以沫的朴素的乡村情感(迟子建《亲亲土豆》);也有传统的仁义美德,当麦生伯身患绝症时,张树声不顾不吉利的名声,毅然将女儿嫁到郑家,让麦生伯含笑死去(张宇《乡村情感》)……

这类作品清晰的表达出作家的“守土”意识,他们都极力规避对乡村生活中“恶”的描写,重点描写乡村传统的生活方式、乡人之间亲密的关系以及农民个性中的闪光点,作品具有“向善”与“向美”的倾向,作家执著的守住这片家园和这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以此来对抗都市的罪恶与丑陋。这种“守土”意识在阎连科的《年月日》中有了最彻底和集中的反映,当村庄遭受大旱,全村人都走光时,先爷毅然的留了下来,他要为全村人看住土地、守住家园,于是他与饥饿、干旱、狼群、老鼠斗争着,坚韧而执著的与土地共生死,并用自己的生命在大旱之年养活了一颗玉黍蜀,作为全村人来年种地的种子。

先爷与土地成了生死与共、相互相依的关系,土地就是他的宗教,他的“守土”精神因此具有殉道般的神圣与庄严。

(二)安守寓言式乡村

这类作品较为复杂,作者的创作目的也各不相同,贾平凹喜欢挖掘乡野乡情,展现乡村的传奇因素,如《美穴地》中人物的命运沉浮竟与一块块的坟地发生着神秘的联系。还有相当一部分作家紧承80年代寻根文学,以一种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关注乡村,对乡村有着自觉的文化审视和批判意识,如陈忠实的《白鹿原》、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等等,也有像莫言这样的“野路子”,很难说他的作品有多么清晰的创作意图,他只是任由自己的文学天分在乡野大地上自由的游走,信马由缰,乡村是他文学天才发挥的最佳场所,高密东北乡是他创作的源泉所在。

这批作品笔下的乡村不再具有本真的乡土风貌,因作家主体创作意图的渗入而具有寓言的性质,作家们不象第一类作家一样为了躲避或抵抗都市的罪恶而潜入乡村,他们有更远的野心,乡村成为他们的试验田,他们通过对寓言式乡村的描绘寄托着他们对农民及整个民族命运的思考。但是,总体说来他们笔下的乡村依旧是一个个封闭独立的形态,作品并无涉及城市对乡村的影响,而作者也无意于乡村的改变及农民的“离土”,就像《檀香刑》中的乡民面对呼啸而来的火车时想的和做的是炸掉它一样,这些乡村对作家的意义就像是一个个珍稀的活标本,供他么审视和分析,以此来实现他们创作的理想和野心。因此这类安守寓言式乡村的作品依然可以纳入“守土”一派。

(三)变化中的乡村——“离土”的开始

80年代铁凝的《哦,香雪》已经预示着农民“离土”的开始与必要,那列轰轰开过的火车寄托着香雪离土的希望,而她那勇敢的跃上火车的举动正表明了她告别乡土的决心,那纵身的一跃定格为“离土”开始的美丽姿态。农村的变革带来了农村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造,市场经济的影响又使农民的生活方式、思想发生了巨变,古老的乡村处在不变也得变的尴尬境地中,“离土”便成为一种大势所趋。这种农民“离土”现象在90年代的乡土小说中有多样性的反映,农民告别土地的方式也多种多样:他们或者走向都市,成为都市中的农民工,以离开的方式表达对土地的弃绝(如尤凤伟《泥鳅》中的国瑞),有的离土不离乡,在农村开办乡镇企业发家致富

(如刘醒农《分享艰难》中办甲鱼养殖场的洪塔山),还有的凭知识脱贫,通过读大学之路永远的离开乡村与土地,在城市中做起了知识分子(如李佩甫《无边无际的早晨》中的李治国)……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加剧,农民还将以更多的方式告别土地。农民由“守土”走向“离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和社会进步的表现,对于农村由“守土”走向“离土”过程中的变化和动荡,一批所谓“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品有了较为深刻的反映和表现。

(四)“离土”的阵痛——现实主义冲击波

以刘醒龙、关仁山、谈歌、何申等作家为代表的作家继承了80年代改革文学关注现实的传统,以清醒的意识和无畏的勇气深入到乡村,对农村改革的方方面面进行全方位的展示,表现农业文明同工业文明的对峙和转型,展现了农民在商品化大潮冲击下心态的变化和人性的蜕变。

“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重点展示了农村改革初期面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分享艰难》中的西河镇危机四伏,不仅镇长和书记间争权夺利,还有政府与公安系统的矛盾、政府同乡镇企业间的经济关系,还有广大村民与基层领导的对抗……农村改革的每一步都走的异常艰辛,而金钱的获得也使得一部分农民的心理扭曲,暴发户强奸少女(如《分享艰难》中的洪塔山强奸田毛毛、《走过乡村》中的倪土改强奸少女倪豆豆),村民抢夺种粮大户的土地、粮食(关仁山《九月还乡》)等问题也在“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中反映。

对于农村改革的种种振荡和冲突,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进行了全方位的展示,表现了作家对农村现实问题的思索。在这批作家看来,商品化大潮对农村冲击、农民告别土地,走向离土之路是不争的事实,也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因此他们虽然展现出农村变革、农民离土的种种艰辛和困难,却也表现出变正是必由之路的思想,这在他们的作品中隐含的生机和希望及乐观的基调中可以体现。

二

由于“守土”与“离土”两种创作意图的不同,使得90年代乡土小说呈现出相异的艺术特色和美学风貌。

第一类“安守牧歌式家园”的作品写的优美恬淡,作品中的乡村是一个远离都市的封闭群落,没有受到都市的浸染和骚扰,而村中的人物也是秉承中国农民的传统美德,讲究忠孝仁义、朴实厚道;而

作家的态度也是十分明确,就是“守住乡土,拒绝都市”。

其实这并不是90年代独创,从30年代的废名到后来的沈从文、汪曾祺都是这种风格的一路,这类作品以其独特的美学风格著称。表现为优美恬淡、平和温暖,而又因为隐含着对乡村原生态将会遭都市侵扰而毁灭的忧虑,他们的作品又表现出一种淡淡的忧伤,如刘玉堂的《最后一个生产队》,虽然在80年代这个生产队的存在是多么的可笑与不合时宜,但在作者写来却充满了温情和这“最后一个”即将逝去的忧伤与慨叹。

相较以前的作品,90年代“安守牧歌式家园”的作品也有了新的变化与发展。首先表现在文体上的改变,以往的那种散文化、诗化的结构被平实的叙述所取代,作品中的人物性格也更加饱满丰富,以往飘逸的风格开始走向厚重。其次作品在内容上更加贴近乡村现实,以往废名等作家的作品禅机、哲理意味浓厚,其笔下的乡村十分抽象,而90年代乡土作家更加关注乡村的现实生活,作品内容也更丰富,这在刘玉堂、阎连科等作家的作品中表现的更为突出,而迟子建的作品则改变不多,依然以其温情的风格取胜。第三是作家心中的理想女性发生改变,在以往的作品中,作者所描写的完美女性就如翠翠般纯洁、剔透,作家所赞美的是其不谙世事的纯洁美好,以保持作品整体的诗化风格,而在90年代田园作品里,完美女性变为《温暖的冬天》中的刘玉贞及《黑蜻蜓》中的二姐的形象,她们不再是温室中的幼苗,作家赞美的正是她们的勤劳、坚韧、质朴,就像刘玉贞,不仅支撑起自己的家,还当上社长领导起一村的大老爷们,这类具有韧性的女性成为90年代乡土小说中完美女性的代表。

第二类“安守寓言式乡村”的作品在90年代乡土小说中具有重要意义,它为乡土小说的创造带来了新质。首先,出于对启蒙立场和政治话语的背弃,作者通常采用平视的眼光来描写乡村,不涉及价值判断及拯救意图,他们站在农民立场,以乡村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写出一个个寓言式的乡间传奇,^[4]而这种平视态度也使他能触及到农民的精神核心层面。其次,他们的作品以长篇小说居多,因为有探究整个农民及民族的“心灵史”的宏大意愿和为农民代言的宏大企图,他们的作品显的开阔,充满了力度,具有沉郁厚重的美学风格。第三是作家对人性恶的发现和重新理解。20年代的乡土小说看到农民身上的劣根性,但却乐观的认为是可以

通过改造消除的,而到了50年代后,大力强调农民在道德和品格上强于知识分子,而需要改造的则成为知识分子,农民文化成了优势文化,而农民身上的恶则被忽略,到了90年代,如果说“安守田园牧歌乡村”的作品着力挖掘农民身上善与美的品德,这类作品则将农民身上的恶一一展现,并且,作家认为,人性中恶的成分是隐藏其中的,并不如天真的人们所想一样可以通过改造而消除。杨争光《棺材铺》中的杨明远,为了能卖掉他的棺材,不惜挑起村里两户人家的械斗,他并非缺钱,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只能是人性深处的恶念在作怪。这些作品将人性中的恶尽情的展现,并赋予其最本真的意义。第四是对苦难的重新诠释。这类“守土”作家揭示了中国农民贫穷的生存现状,对于他们遭受的苦难给予了重新的理解。以往的作品都认为苦难是外界力量所造成的,如政治运动、阶级斗争、革命风暴等,农民被迫卷入一场场的运动中,从而造成苦难人生。但在这批作家眼中,农民自己也应对苦难负责,他们的愚昧麻木落后也是造成苦难的原因,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将苦难进行了黑色幽默式的解构,故乡的革命运动缘于村民的争权夺利,村民的苦难由他们自己一手造成。这类作家抛弃以往政治视角,对农民所遭受的苦难进行了别样的理解和解释。

比起80年代改革文学,90年代的“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品显得更加开阔、宏大,乡镇企业、土地承包、民工进城、贪污腐败等一系列农村转型时期的问题与冲突都被纳入了作家的视野。“‘城市化’注定了要使我们失去一部分‘过去’的同时,失去与其连带着的诗意”^[5]在叙述方法上强调细节描写,注重对事件、场景的写实性的客观再现;此外,小说为突出改革的艰难,往往在一部作品中设置多重矛盾,让人物处于多重矛盾之中,情节紧张、急湍,具有戏剧化效果。在人物塑造上,“现实主义冲击波”成功塑造了一批孔太平式的乡镇干部形象。他们置身农村改革复杂的矛盾漩涡中,需要和各方势力斗争,他们一方面要以个人威望和能力处理问题,另一方面又得靠一些非正当方法化解危机,忍辱负重、朴实坚韧,在基层默默工作着。作家们为我们塑造了一批农村脊梁式的人物,通过他们与各方矛盾的斗争反映出农村改革的艰难,也通过他们的坚韧执著表现出改革蕴藏的生机和希望。

“现实主义”冲击波写出了中国农民从“守土”

到“离土”的必然趋势,并揭示出这条路将走的异常艰难与长久,具有进步的意义。但作品的冲突过于集中,戏剧化过强,在人物刻画方面不够深入,虽然写出乡镇干部面临的种种冲突,但他们内心的脆弱与痛苦展现不够,这些问题也是这批作品的缺陷所在,另外过于芜杂的生活场景的描写也影响了作家所应该达到的审美高度和思想深度

三

从《不能走那条路》开始到现在,农村的发展、改革已经过去数十年,农民抛弃安土意识,走向离土之路也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大批的农民如张栓一样,不再靠土地发财致富,从文明的进程看,农村城市化、农民要逐步脱离土地是符合历史进步的潮流的,但是现实远不是如此的简单,无论是“守土”还是“离土”,作家都遇到矛盾和困惑。“守土”作家固守的乡村永远隔绝于现实之外,遥远而封闭,传统的人伦与道德究竟能不能经历商品化大潮的冲击?作家们心里没有底,因此只能在遥远的乡村固守住自己的梦。而农民“离土”后是否就真正走向解放?对于中国这个有着悠久传统的农业社会来说,社会改革极度不平衡,农民身份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当许多农民舍弃土地,沿着现代化的道路跑向城市时,作家的内心也并不是全然自信,“离土”之后却又眷恋起乡村:“乡下放进城里来的一只风筝,飘来飘去已经二十年,线绳儿还系在老家的房梁上。”“但是总觉得骨子眼里还是个乡下人。”因此,在许多作家那里,仍然在“守土”与“离土”间矛盾与困惑着。

参考文献:

- [1] 李 琮.〈不能走那条路〉及其批评[N].文艺报,1954-01-11,(2).
- [2] 陈少辉.鲁迅乡土小说他者视阈的迁移与阐释意义[J].湖南工业大学学报,2009(1):69.
- [3] 张 炜.九月寓言“代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97.
- [4] 贺仲明.“农民文化小说”乡村的自审与张望[J].文学评论,2001(3):125-131.
- [5] 赵 园.地之子——乡村小说与农民文化[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87.

责任编辑:李 珂